中國間諜滲入美國反恐情報中心
孔子學院是大外宣下畸形產物
中國正在逐步蠶食世界秩序

習近平
改變世界
——中共謀求稱霸

■ 吳大兵

外參出版社

目錄

中共謀求稱霸世界

美國內政外交政策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中國戰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博士（Michael Pillsbury，PhD）從1970年代初開始在美國軍界、情報界、行政和立法機構從事中國研究。先前出版過多種有關中國軍事戰略問題專著的白邦瑞剛剛出版了一本新書，題目是《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超級大國美國的秘密戰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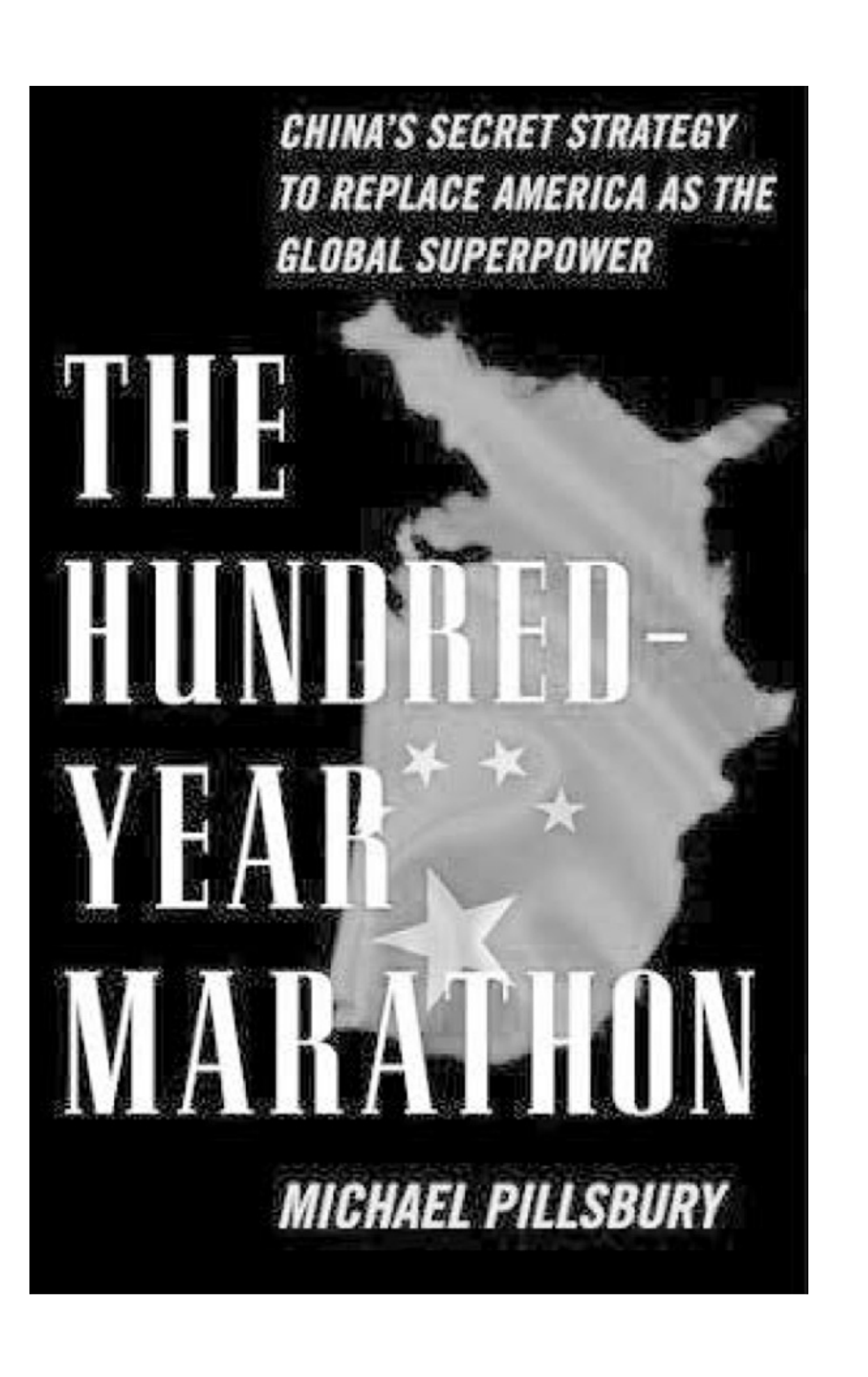
白邦瑞表示，這本書是他研讀中國軍事戰略文獻50年、與眾多中國和美國專家切磋交流心得的結晶。

從1970年代的尼克松行政當局到現在的奧巴馬行政當局，他都在其中擔任過職務。《百年馬拉松》正文之前的作者附言透露了他的信息來源背景："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防部部長辦公室，以及國防部一個部門在本書出版之前對本書進行了審核，以確信機密信息沒有泄露。我讚賞審核人員拿掉敏感的行動細節以免危及實地應用的某些方法"。

對中國茫然無知

《百年馬拉松》一書正文230頁，另外還有密密麻麻的小字註釋將近70頁，顯示了白邦瑞鄭重其事，讓感興趣的讀者可以按圖索驥，也讓批評者可以明確他的論點和論據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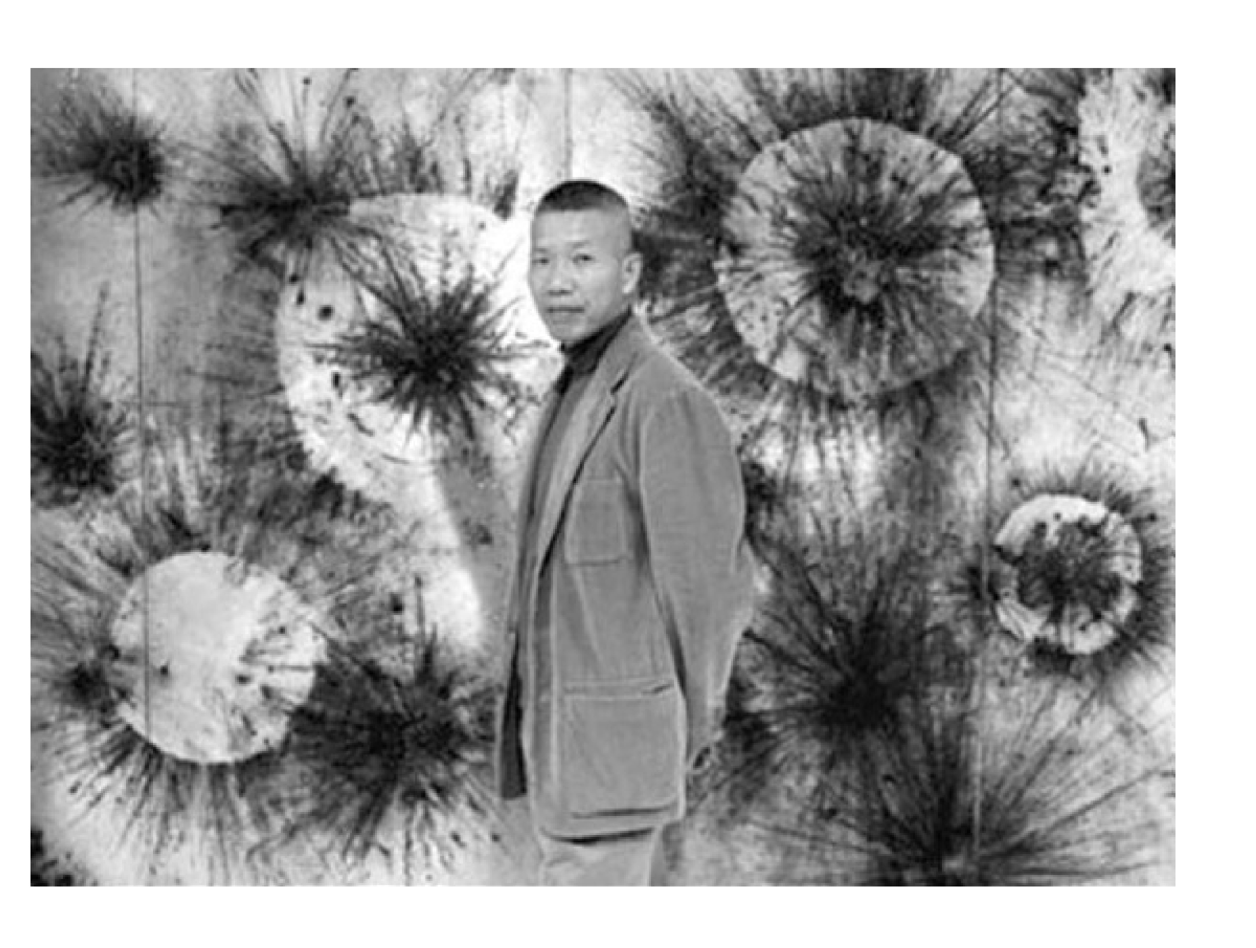
白邦瑞在書的導言中先繪聲繪色地講了一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2012年11月30日，中國藝術家蔡國強在美國國會大廈西面的國家大草坪上舉行的一個儀式上接受國務卿克林頓的代表授予的一個獎章，然後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了一次名為"黑色聖誕樹"的爆炸藝術表演——在他的控制下，一棵裝飾著兩千個爆炸裝置的四層樓高的聖誕樹，在眾人眼前三次爆炸，化為濃厚的黑煙和滿地的碎屑。



《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超級大國美國的秘密戰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白邦瑞寫道：“我不知道在場的來賓當中有誰思考過為什麼他們在觀看一個藝術家在美國首都將基督教信仰的一個象徵炸為齏粉，而且是在不到一個月就是聖誕節的時候。當時，我也跟著其他觀眾鼓掌，不能確信我當時是否想到了這種做法的顛覆性”。

白邦瑞隨後查閱有關蔡國強的資料，發現蔡國強在中國的許多粉絲是所謂的鷹派民族主義者，而蔡國強的許多鷹派言論也讓他感到不安。如蔡國強把恐怖主義分子在2001年9月11日對美國的襲擊稱作世界觀眾看到的“壯觀景色”，好像那是藝術品；再如在美國軍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受到汽車炸彈、路邊炸彈不斷襲擊之際，蔡國強模擬汽車炸彈爆炸，並要“他的觀眾欣賞恐怖分子襲擊和戰鬥的某種壞事變好事之美”。



蔡國強

蔡國強竟然如此成為美國人的座上賓——在蔡爆破聖誕樹之前，他剛剛獲得國務院首次頒發的藝術獎章，獎章由克林頓國務卿親自授予，連同25萬美元的獎金。

白邦瑞認為，蔡國強是一個絕妙的象徵，清晰地顯示了太多的美國人（其中也一度包括他這個老資格中國問題專家）根本就沒看明白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究竟是怎麼回事，就像是“傻乎乎又樂呵呵的野蠻人興高采烈地觀看眼前的表演，全然不知其中的顛覆性意義”。

那麼，過去三四十年來，在美國占主流的對中國的看法究竟有什麼錯呢？白邦瑞在題為《一廂情願》的導言中列出了五條：錯以為跟中國保持接觸就能帶來全面合作；錯以為中國正在走向民主；錯以為中國十分虛弱不堪一擊；錯以為中國希望而且也確實跟美國一樣；錯以為中國鷹派沒什麼勢力。

《百年馬拉松》一書正文總共11章。前10章主要是講中國，最後一章則是白邦瑞為美國如何應對中國削弱並最終取代美國的戰略提出的一些建議。各章內容簡介如下：

第一章《中國夢》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以來很快顯示出他有一個自己的夢想，這就是讓中國重新雄踞世界之首，但這也是中共在1949年奪取中國大陸掌權之

後一直孜孜以求的百年強國夢（即從1949年到2049年，用100年時間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為了實現這一夢想，中國最初盡力表現柔弱，以便儘可能多地從蘇聯那裡獲取的援助；跟蘇聯鬧翻之後，中國再對西方故伎重演，並獲得更多、更大的收穫；蘇聯人當初看透了中國的把戲，但西方直到今天依然是糊裡糊塗。

第二章《戰國爭霸方略》

主導追求強國夢的中國鷹派戰略家們的基本思路是春秋戰國時代群雄爭霸、逐鹿中原的思維；在白邦瑞看來，這種思維可以歸結為：讓敵手安逸不驚，避免引起敵手注意；操縱敵手的謀士，讓敵手謀士為你說好話；隱忍幾十年不輕舉妄動；竊取敵手的思路和技術為我所用；赤裸裸的軍力不是贏得長期競爭的關鍵因素；知悉霸主會為保持霸主地位無所不用其極；要永遠把“勢”放在心上；在平時和戰時瞭解其他潛在挑戰者，知悉自己與它們的強弱對比；永遠保持警惕，避免被包圍或欺騙。

第三章《只有中國才能找尼克松》

打開跟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的關係，長久以來被認為是尼克松的一大外交成就；但實際上，不是尼克松當年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而是中國打開了美國的大門；中共政權的鷹派民族主義者早在尼克松想到接近中國之前，就開始謀劃如何接近美國；而中國接近美國和西方跟當年接近蘇聯的目的一樣，只是為了索取和騙取援助以及先進技術，以便追求稱霸世界的強國夢。

第四章《“白先生”和“綠女士”》

中國到底是怎麼回事？究竟對美國是什麼戰略意圖？這些問題讓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長期感到無從索解；這時候，從中國逃出的、自稱知曉中共高層意圖的中國人所說的話有了一種不同的參考價值；這些人當中有一位白邦瑞稱之為“白先生”（Mr. White）；有一位則是“綠女士”（Ms. Green）。

“白先生”在1990年代初聲言，敵視美國的鷹派在中共最高層壓倒了溫和派；“綠女士”則聲言，鷹派在中共高層都是老派的不入流的人物，而且迅速喪失了他們原來就不多的影響力，中國是希望跟美國密切合作的。

後來，美國中央情報局得悉，“綠女士”是中國用以忽悠美國的間諜；白邦瑞寫道：公眾現在不知道“到底是哪種情況更糟糕；是她傳送機密給中國，還是她說話讓美國人感到（糊裡糊塗的）放心”。

第五章《美國是大撒旦》

從1989年6月4日開始，中共再度對中國人全面醜化美國，“從1990年開始，中國教科書改寫，美國被描繪為一個霸權國家，150多年來一直處心積慮壓制中國的崛起，摧毀中國文明的靈魂；美國在歷史上對中國的重大和大量的援助被一概抹殺。這種再教育的名稱是無害的‘全國性愛國主義教育項目’”。

第六章《中國的信息警察》

中國實現百年強國夢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好意，因為這種好意意味著大規模外來投資，接納中國的出口產品，在中國政府組織竊取技術或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時候不認真追究以及對中國踐踏人權視而不見。

而西方國家領導人之所以對中國做出上述的讓步和遷就，主要是因為他們相信中國總體來講是在“正確的”道路上前進，在走向自由市場，有成效的國際合作，以及政治自由化；而且一切有賴於中國內外有別的宣傳。為了維持這種宣傳，中國為給它說好話的商界和學術界人士提供各種好處給，對持批評意見的人則竭力打壓。

第七章《剋敵制勝的殺手鐧》

鑒於中國的綜合國力現在還在美國之下，中國軍方多年來一直在研究以弱勝強的殺手鐧；這些殺手鐧包括摧毀美軍情報收集和通訊衛星，使美國優勢軍力無從發揮；使用靈巧智能武器攻擊敵手的雷達和無線電通通訊電台；用電脈沖武器摧毀敵手的電子武器；用電腦病毒摧毀電腦軟件等等。

第八章《喬裝資本主義》

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在聲稱推行經濟自由化，然而，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只是忽悠世界；中國雖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並從中得到巨大的好

處，但中國無意遵守世貿組織規則，設置了各種壁壘讓外國公司難以進入並在中國發展，同時大力扶持國營企業，以便為中共鷹派所追求的中國夢服務。如今，聽命於政府和中共的國營企業的產值占中國非農業國內總產值40%以上。

第九章《2049年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

按照過去30年中國發展的勢頭，中國將很快超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大國。由中國主導的世界將是什麼樣子？假如中國鷹派決定中國政策，情況將不妙，因為那將意味著：中共所提倡的無視乃至敵視個人權利的價值觀將取代美國價值觀；中國將「和諧」互聯網上的異議；中國將繼續阻礙世界民主化進程；中國將跟美國敵手結成聯盟；中國將輸出大規模空氣汙染；中國將日益瓦解聯合國和世貿組織；中國將擴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從中獲利。

第十章《警告信號發射》

中國已經開始採取挑釁性敵意行動，試探美國及其盟國的決心。2007年，中國發射導彈摧毀自己的一顆廢棄的氣象衛星，一舉顯示了中國反衛星能力，並造成危險的大片空間垃圾，危及所有宇航國家的空間資產；2009年，參加哥本哈根世界氣候變化問題峰會的中國官員一反常態地展示粗魯，打斷西方國家外交官的發言，同時又不提出什麼建設性意見；在美國對台軍售問題上中國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強硬姿態；中國之所以有這些表現是因為“中國領導人認為如今的‘勢’已經決定性地轉向有利於中國，美國的相對衰落加速超過他們的預期”，於是在南中國海不斷有大動作，在東中國海宣布防空識別區。

美國應如何應對中國

白邦瑞在書中反覆指出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多年誤判中國，也反覆指出他本人也是多年誤判中國，對中國的發展大勢認識不清，甚至完全弄擰了。

他在《百年馬拉松》最後一章建議美國也不妨採取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群雄爭霸的一些戰略思維，並提出美國應對中國時可以採取的12步：承認問題存在，看清中國，不能被繼續忽悠；不能莫名其妙地繼續白白給中國提供各種援助；知己知彼，對美國的競爭力心中有數；發展競爭力戰略，謀求改革進取；尋求美國國內各派各方共識；發展國際合縱連橫；保護政

治異議人士；明確表示反對損害美國的競爭行為（如盜竊美國商業和科技機密）；將汙染製造者曝光；揭露貪腐和信息封鎖；支持民主改革派；追蹤並影響中國鷹派和改革派之間的辯論。



白邦瑞博士（Michael Pillsbury，PhD）

白邦瑞寫道：“不容否認的是，本章提出的這12步將引起與中國的摩擦。我的一些同事經常警告我不要批評很容易上火的中國人，但這種做法是無視亞里士多德的告誡，這就是，‘批評是我們可以很容易回避的事情，只要我們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是’”。

白邦瑞繼續寫道：“北京取美國而代之成為地緣政治頭號大國的戰略有賴於美國的好意和幫助。美國必須像當年的英國那樣，在美國逐漸崛起逐漸取代英帝國時按兵不動。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如此努力塑造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一個原因。”

白邦瑞表示希望美國看清、看透中國的這種戰略意圖，不要中了中國的計。

《百年馬拉松》一書的導言和正文11章當中的七章的開頭引語都是取自中國的兵書《三十六計》。(趙致遠)□

中國對世界是一個禍害

如果今天的中國要從昔日的蘇聯吸取經驗教訓，就要明白“強扭的瓜不甜”這個再淺顯不過的道理，而從改採收縮的方式重建國家認同，切勿讓民族問題成為中國內部改革的絆腳石

“天朝”這個國家，它們不會讓你瞭解過去，因為它本來就生於不義。這個國家，它們不會讓你看到真相，因為它到處充滿了罪惡。這個國家，它們不需要你學會思考，因為謊言已代替了真理。這個國家，它們不要求你道德如何，因為人的良知會激發起正義。　這個國家，它們不允許你瞭解世界，因為愚昧才有利於統治。

——網友

近年來有無數書本和文章都預測，中國幾乎可以確定會崛起成為全球霸權。然而，《跛腳的巨人：中國即將爆發的危機》的作者譚寶信（Timothy Beardson）卻明確地反對這個廣被接受的假設。譚寶信從過去三十多年一直在亞洲生活和工作，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即創立克羅斯比金融控股公司，當時是遠東最大的獨立投資銀行；1989年成為第一家中國授予執照的外商投資銀行。此後，他進入學界，成為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他揭露了現今中國面對的難以數計的挑戰，以及當局錯誤的因應方式。針對這些挑戰提出大膽的政策處方，並解釋為何中國不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下一個超級強權。



譚寶信

在這本出版後即名列倫敦《泰晤士報》“每週暢銷書”排行榜的新著中，譚寶信將中國當下的情勢如數家珍、一一道來：無可阻擋的人口結構前景造成的勞力短缺、人口老化、極端的兩性人口差距，甚至人口減少。此外，中國面對社會不穩定、環境遭破壞、普遍的低科技經濟且缺乏創新、缺少有效的福利安全網、僵化的治理結構、激進的伊斯蘭教派潛伏在邊境等威脅。他不像章家敦那樣輕率地斷定中國即將崩潰，卻篤定地指出：雖然中國能夠、且會進一步壯大，但它不會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強權——至少在這個世紀不會。

中國從來不是世界級強權

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夢”一路凱歌高奏。習近平喜歡向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中尋求治國的靈感，而“漢唐盛世”就是他可以效仿的樣板。習近平仿效毛澤東當年召集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了一場文藝座談會，應邀出席的七十二位代表被網民戲稱為“七十二賢人”。畫家范曾也是其中之一。因深感龍恩浩蕩，范曾在北大中國畫法研究院召開“學習‘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研討會”，並且限韻作詩為賀。九位教授的詩作，五人用詞非皇即聖，范曾詩中有“皇圖八萬、龍吟昊宇、鳳擇高枝”之語，邵盈午詩云“鼎革親傳列聖意”，萬俊人詩云“金秋帝廟正高陽、一代天驕成大夢”，朱彥民詩云“躬逢赤縣遵皇則”，周建忠詩云“中興可待承明主。”五四運動的搖籃北京大學上演了一處張勛復辟式的鬧劇。

從這些詩句中發現，似乎“習氏中興”、“習氏復興”呼之欲出。然而，面對躊躇滿志的習近平和中共政權，譚寶信澆了兩大盆冷水：其一，他指出，中國從來不是跨大陸的、世界級的強權，即便是其國力最強盛的漢代、唐代和清代前期，其影響力亦只是侷限於東亞大陸而已。其二，他強調，中國從來不是一個自我誇耀的“熱愛和平”的國家，中國跟俄羅斯一樣，把永無休止地擴張當作最大的喜好，直到擴張超過了自己所能承受的極限走向崩潰，這種擴張不會停止。

中國一向以世界的中心自居，彷彿除了自己之外，其餘的國家都是不毛之地、蠻夷之地。而譚寶信偏偏說中國從來不是世界級的強權，這未免太傷害中國人的自尊心了。但譚寶信的論點是有若干論據支撐的。就地域而言，中國的世界影響力向來有限，它的軍隊從未越過裡海東岸，在最盛時期最多不過是一個極大的區域強權。所以，“羅馬和大英帝國是跨大陸強權，而中國不是。”就文化和價值的滲透力，也就是所謂的“軟實力”而言，中國文化影響的範疇，始終沒有超越日本、韓國、越南等周邊的少數國家。今天中國以文化大國自居，但使用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人數，卻只有不到兩千萬人，少於英語、法語、俄語、葡萄牙語和阿拉伯語。而真正的世界級的強權，意味著它使用的語言可供其他人學習，以便分享文化、記述或社會權力。譚寶信通過多組數據的分析和比較，戳穿了中國官方公布的2010年學習中文的外國人高達一億的謊言——這是一個跟大躍進中畝產萬斤相似的肥皂泡。



北大“學習‘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研討會”。

中國自古就標榜“不戰而屈人之兵”，共產黨政權更是自欺欺人地宣布“和平崛起”，但是，譚寶信引用哈佛大學中國學者江憶恩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國在1911年之前的三千年間，總共打了3790場內外戰爭；而在中

共1949年建政後直到1985年，中國涉入11場外交政策爭議，並在其中8場訴諸暴力解決，中國對暴力的使用堪稱“高強度”。近二十年來雖然稍有收斂，但習近平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又引起了周邊國家普遍的疑慮，尤其是對台灣展示出的赤裸裸的敵意，讓譚寶信不禁仗義執言：“看到一個小小的民主地區被世界最大的非民主國家以軍事壓碎（或者嚇到屈服），就足以說服許多人相信中國對世界是一個禍害，完全不尊重人的自決。”

清末大難臨頭的氣氛已然四處瀰漫

譚寶信敏銳地捕捉到，當下的中國在表面上熱油鼎沸、車水馬龍，在骨子裡卻已經是停滯不前。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一旦停滯的態勢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會啓動。譚寶信評論說：“即使在威脅可以去除的地方，也缺少採取行動的活力和意願。法律已經通過，但未落實執行；問題已經發現，但沒有解決；有些問題沒有人關注。改革和嚴肅的政策制訂似乎與特權機器相衝突。”就連曾經做過習近平老師的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也在大聲疾呼，如果要搶救中國這個早已病入膏肓的病人，時間已經所剩無幾了。孫立平估計歷史留給習近平的時間，與譚寶信的評估不謀而合：最多十年而已。但是，當權者“似乎以世紀為單位思考，而實際上他們必須以年來計劃。”用一句不雅的中國俗語來說，這簡直就是“皇帝不急太監急”，因為每一盤棋局總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中國的執政者信心滿滿，毛時代憧憬的超英趕美似乎倚馬可待。譚寶信卻在書中指出，不要高興得太早了，“中國今日面對的主要挑戰十分嚴重，包括環境、福利、人口、就業、邊境、資源、科學和穩定——各種經常重疊的因素。”作為一名銀行家和投資家，譚寶信的每一個論點的背後，都引用了大量的、來自不同渠道的數據和材料來支撐。僅以環境惡化和生態浩劫而言，中國的環境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已遭到嚴重破壞，且迄今未見明顯改善的跡象。2014年的一份中國國家報告指出，中國1/5的農地遭到鎳、鉛、鎘、汞和砷的汙染已達危險水準。其他報告也已揭露，落後的農耕方法導致水汙染惡化。

在國內安全領域，“當局維持龐大的情報和安全機構以壓抑異議，不僅虛耗金錢，更重要的是讓國家難以與人民進行任何道德價值的討論。”雖然執掌政法大權近十年的周永康垮台了，但他依託的那套維穩機制仍然在高速運作，如同一台無人有膽量拔掉其電源的絞肉機，如同梁啓超在清末對當時局勢的評估：“大小官僚以萬數計，夙暮孳孳，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革命黨為事。”最明顯不過的一個例證是：當香港占領中環運動興起之後，習近平不敢直接針對運動本身作出論斷，卻命令安全系統大肆抓捕國內支持香港占中運動的民間人士，短短一個月之間便有數百人被捕——有的人僅僅是在個人博客中發表一張在家中舉起雨傘的照片而

已。可見，習近平內心的恐懼到了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地步，哪裡有絲毫的自信可言？

中國又走到了清末那種無力回天的境況之中。譚寶信感嘆說：“中國今日一些問題的急迫性、那種火車即將出軌的感覺，類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清朝即將大難臨頭的氣氛。”高官顯貴們紛紛將家人和財產轉移到西方國家，政治局中的“老男人們”大都成了“美國人”的爸爸，然後教育那些“不願做奴隸的人民”如何“熱愛偉大的祖國。”

一個縮小的中國，是福非禍

當愛國主義成為中共政權的最後一支強心針的時候，當政者往往通過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矛盾，這就是習近平為何在周邊挑起釣魚島、東海、南海爭端的原因。但是，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對於近代以來掠奪了中國上百萬平方公里領土的俄國，習近平卻畢恭畢敬、不敢說半個不字。可見，其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也是假冒偽劣產品。

對於以《環球時報》為代表的法西斯式的民族主義，譚寶信開出的藥方是：“中國如果片面放棄西藏、內蒙和新疆，甚至一部分的甘肅、青海和四川，很可能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上反而變得更強大。”從現實主義角度來考量，如果當地人基本上想出走，為了阻止他們而耗費龐大的財務、政治、外交和社會成本可能不值得。而學界的研究指出，“大規模的種族多樣性會削弱經濟成長。”對中國來說，龐大的安全支出是一項沉重負擔，阻礙其他更有利的選項。

1991年蘇聯的瓦解，被中共視為一場悲劇，以及防微杜漸的前車之鑑。習近平論及蘇聯共產黨政權崩潰之時，色厲內荏地痛斥戈爾巴喬夫的“叛變”，並反問說，不知為何“竟無一人是男兒”——偌大的帝國之類，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捍衛黨和黨的領袖？殊不知，蘇聯的崩潰，不是因為戈爾巴喬夫輕率地啓動政治改革，而是戈爾巴喬夫始終不肯放棄帝國遺產，如果他早幾年放手讓那些本來就是巧取豪奪而來的、其實已經離心離德的邊疆國家以公投決定去留，那麼蘇聯的民族問題就不至於成為內部改革的心腹之患。

如果今天的中國要從昔日的蘇聯吸取經驗教訓，就要明白“強扭的瓜不甜”這個再淺顯不過的道理，以收縮的方式重建國家認同，正如譚寶信所建議的那樣：“如果是一個漢族國家，有著更協調一致的自我、價值和目標的觀點，它可能更富裕、更強大、更穩定、更受尊敬、更現代和更安全快樂。……中國可以回到明朝的邊界，而不堅持擁有多種族清帝國的大多數領土。西藏高原的水源和新疆的礦產及能源會有許多爭議，不過，協

議可以達成。只要有那些能讓社群滿意生活的地區，省的劃分沒有必要完全依照既定的疆域。”二戰之後英國從全球殖民地撤退，從輝煌的“日不落帝國”變成一個歐洲中等強國，對於普通國民來說，儘管經歷了一段心理的落差，可是他們很快發現了這樣的國家形態跟能讓自己安居樂業——再也不用派遣子弟兵四處爭戰乃至拋屍異鄉了。因為，“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所成就的不過是少數獨裁者的慾望和野心而已。如今，中國需要的不是胡吃海喝，化身為歌利亞那樣的巨人，而是竭力減肥，瘦身之後方能去除三高，恢復健康。

如果中共執政者拒不接受這樣的忠告，仍然採取對內鎮壓和對外擴張齊頭並進的政策，那麼，這將是一條“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不歸之路。無論維穩經費如何節節攀升，中共政權永遠無法達成穩定的目標，正如譚寶信指出那樣：“如果花錢在日增的國際軍事擴張，並建立更大的國內安全機構以管理不穩定，以致無法完全實施社會計劃，將會產生惡性循環，因為脆弱的社會福利將引發進一步的不穩定。”那一天，為時不久。（余杰）□

“沒有西方的世界”已經到來？

“沒有西方的世界”是已經到來、正在形成還是尚未浮現目前也許仍待解，但“典範”是難以消滅的，在北京已逐漸開始於現實世界建構替代性秩序的當下，若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國家再不修正傳統的觀點，也許就只能坐以待斃了

2007年夏季，現任美國海軍研究院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教授的納扎尼・巴爾馬（Naazneen Barma）、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的資深研究員和亞太安全項目副主任厄利・拉特納（Ely Ratner）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系教授史帝芬・韋伯（Steven Weber）聯名在《國家利益》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為“沒有西方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the West）的分析文章；當時，他們主張就國際政治的現狀而言，學術界的論述基本上都是非常不恰當的，而這種不恰當更是已經到了“危險”的境地，導致後來衍生而出的認知都是錯誤的。

誤解致使政策方向錯誤

巴爾馬等人當時所言之“錯誤”究竟為何？在2007年的文章中，其論述是這樣的：他們認為崛起的強權，尤其是中國，不可能挑戰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也不可能同化於這樣的秩序中，因為對於中國而言，這兩個選項基本上都不具任何吸引力。為什麼中國政府要接納一個與其大部分國內和國際利益相左的自由體制？此外，有何理由它必須與世界上最富有與最有權勢的國家對戰呢？將中國視為夾在兩選項之間躊躇不前的崛起強權，未免太過嚴肅地看待根本不甚完美的學術理論；更糟的是，還有可能因此對這個崛起強權的行為做了錯誤的詮釋。

2014年，我們在國際政治場域上看到的是極大的轉變，對於美國而言，強調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似乎已是美國官員在重要場合發表談話的重要言辭之一。在11月初美國總統奧巴馬訪中參加APEC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高峰會之前，國務卿克里就曾在《華盛頓郵報》的訪談中表示，“美中關係在當今世界上最具深遠影響力，並將決定21世紀的全球局面”；此前，國家安全顧問賴斯於9月訪中時，一抵達北京就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訊指出，“21世紀所面對的大多數全球挑戰都需要中美合作，不然無法有效處理。”

經過7年之後，巴爾馬等人再度聯名於《國家利益》上發表題為“歡迎來到沒有西方的世界”（Welcome to the World Without the West）的分析文章，延續7年前的觀點，對現今的大國政治進行更完整的檢視，

更提出現實上的問題。

對於美國官員近來的言論，巴爾馬等人在文中表示，這樣的舉動絕非外交禮節，這就是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如何觀看世界的核心信號；目前華盛頓決策圈內的主流言論，即認為美國與中國無論成敗都必須聯繫在一起，而這個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都必須隨著它們載浮載沈。若美中兩大強權能將彼此的關係往對的方向發展、有效合作，那麼事情就會順利發展；如果沒辦法有這樣的結果，那麼往後數十年的世界就很難決定前進的方向。

如同前文的陳述，巴爾馬等人認為一味認定中國會在同化或挑戰世界秩序這兩個選項中進行選擇，這樣的世界觀是有問題的，但華盛頓方面的中國政策觀察，似乎都將目標放在盡可能讓中國同化於當今的國際秩序，但又同時準備相關的應對措施，一旦中國選擇挑戰，那麼美國就有責任減低其所造成的傷害；這種兩面都下注的政策，基本上已經主宰了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有超過20年之久。

自由世界秩序的崛起強權

巴爾馬等人在日前發表的文章中，主張重新檢視現今局勢，在國際政治的場域上，目前最大的問題已不是北京是否會受到誘因驅使進而加入既存的國際體制，也不是美中關係是否會像螺旋般的急轉直下；儘管兩國在許多方面的競爭確實有加劇的趨勢，但懷抱傳統思維的分析家，仍錯誤地將雙方的衝突視為唯一且可能的選項。然而實際上，更有可能發生的應該是，這些崛起中的強權會致力於建構出繞道於自由秩序、但與該秩序平行的多邊架構，更可能以根本的方式重新形塑國際的政治與經濟。

最近期且最鮮明的例子就是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的動態，這個機制的建立目標是為了對二戰過後最具指標性、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林貨幣體系”（Bretton Woods）、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及亞洲開發銀行等機制提供替代方案。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是北京的智慧結晶，日後也可能由中國牢牢地掌控，目前印度和其他20個發展中國家都已簽署為創始會員國。

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當然不是唯一繞道西方自由秩序的機制，巴爾馬等人指出，上海合作組織（SCO）、金磚五國（BRICS）和中國目前正在倡議的“新絲路計劃”以及其他區域整合組織等，都是這類機制的代表。

然而，這些機制是否能完美地取代由西方國家主導、在自由世界秩序下運作的多邊體制呢？巴爾馬等人認為不可能，但重點不在於這些新機制

能否取代目前看似脆弱的全球秩序，而是它們發展的速度、方向和目的，在接下來的10年間，能否提供具有意義的方案和選項。“沒有西方的世界”已比大多數人預期的來得要快了許多，全球金融危機的現實更加速了非西方國家的崛起。

巴爾馬等人質疑美國政策相關人士的觀點，認為美國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必須轉移這種知識上的謬誤，並儘快從這種錯誤的二分法中跳脫出來，別以為中國只有加入現存體制、成為“負責任之利害關係人”以及可能透過戰爭挑戰現有秩序這兩個選項。

此外，美國的戰略專家也必須承認，採取“防守”的策略實際上是幻想成分多過現實，這並不是說建立一個開放、有規範的國際體系是不重要的，而是有必要去觀察那些存在於外部、侷限於狹隘地緣關係和議題領域的體制。

巴爾馬等人進一步指出，“偉大”的美國在21世紀的任務，並非強化或修補既存的國際架構，相對地，首要之務應是追尋那些正處於發展初期之機制和組織的軌跡。隨著“沒有西方的世界”在國際政治場域上的角色日漸重要，華盛頓已經不能再倚靠二戰後所建立、已持續發展半個世紀的那些體制；也就是說，針對崛起強權所進行的“破壞性創新”，採取更主動的談判才是必要的。



中國一直透過建構有別於西方世界的多邊組織來伸展勢力範圍。

與此同時，美國更必須好好思考該如何回應這些“非西方”的體制，儘管直到現在，華盛頓與其盟國都還有本錢忽視像金磚五國或上海合作組織這樣的機制；然而，隨著崛起強權所獲得的影響力及本身的能力愈發強大，這樣的應對態度已不足以處理目前的國際局勢。

西方必須修正既定的典範

儘管巴爾馬等人在7年後仍堅持原有的觀點，甚至認為美國政策制定的相關人士，應採取更積極的方式面對這樣一個已然成形之“沒有西方的世界”；然而，喬治城大學地緣政治學助理教授艾里克·沃頓（Erik Voeten）卻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評論指出，所謂“沒有西方的世界”，實際上還不會那麼快到來。

沃頓認為，對於那些與美國有緊密關係的現存機制來說，中國目前確實建構了許多與其擁有類似目標的組織；然而，我們尚不清楚的是，中國所建立的這些平行機制，是否真正能從根本上挑戰現存秩序，或對中國與全球多邊機制之間的關係產生多麼深刻的影響。因為其它具有一定權勢的國家，比方說歐洲許多國家和日本，長久以來也在做一樣的事，它們建立屬於自己的機制、追求它們自己的政治目標，但同時還是會與全球架構的體制保持緊密的關係。

巴爾馬等人在文中舉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為例，關於這一點沃頓也進行反駁，他認為早就已經有許多類似的多邊發展銀行，散布於全世界所有區域間。這些銀行在會員國和建立目的上，本來就有部分的差異與重疊；當然，也有許多相關證據顯示出，國家會利用這些區域性的發展銀行，來達到它們的政治目的。這些銀行到底會貸款給哪些國家、或基於什麼目的來核發貸款，取決於創始會員國的政治偏好；若你無法從這個銀行成功貸款，就去找另一個，若你有足夠的能力，那麼你甚至可以自己創一個。

沃頓的看法是，這是全世界擁有一定國家都在使用的方式，日本長久以來都利用自己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優勢來發展地緣政治的目標；同樣地，歐洲也有它們依循自身標準和規範的開發銀行，其運作的方式可能也會與美國的偏好相左，這本就是國際政治的常態。